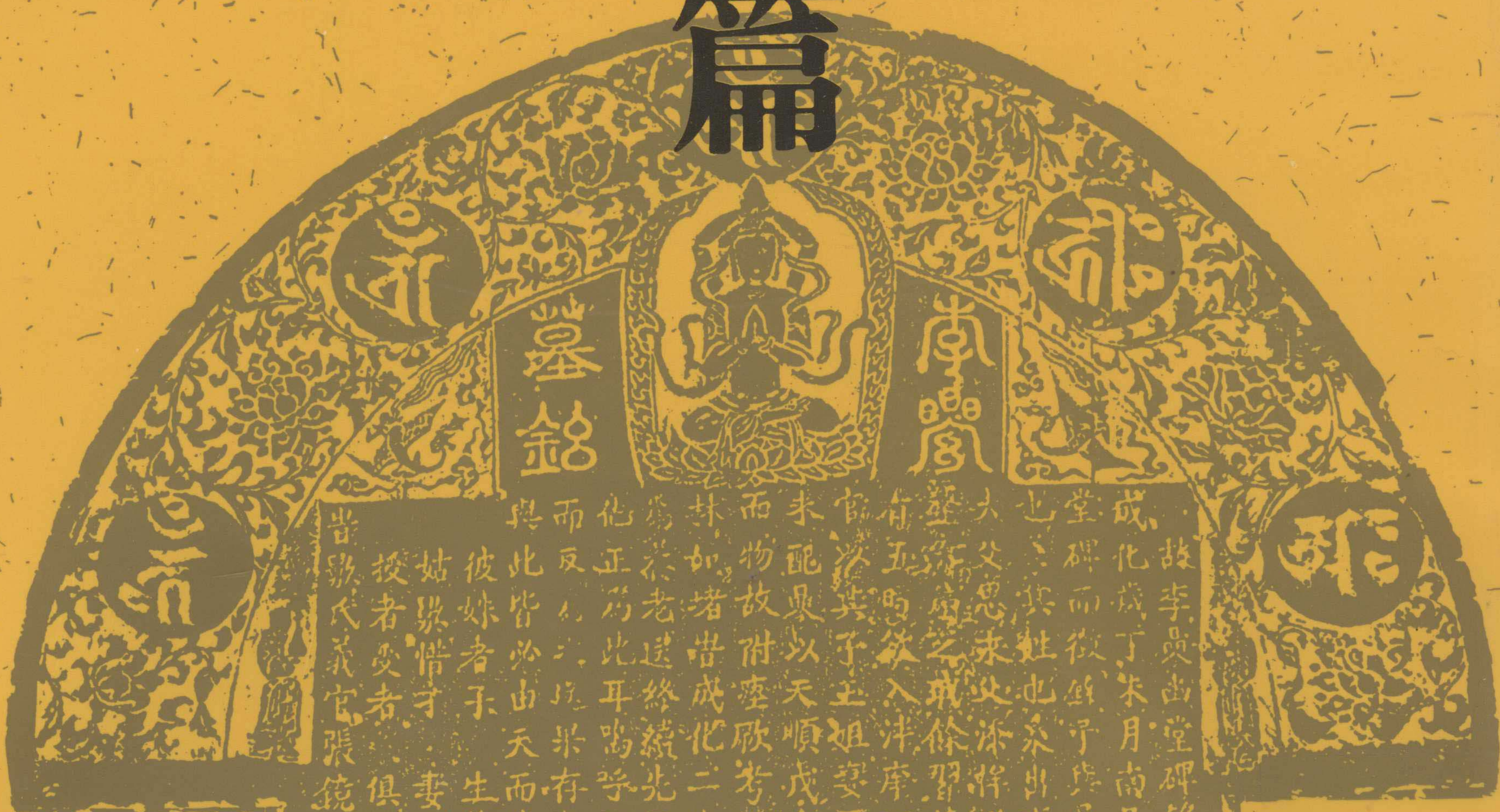


大理叢書

金石篇

主編／楊世鈺

本篇主編／張樹芳



故李曼山堂碑銘
成化歲丁未月南呂同鄉張
堂碑而徵鮮予與曼山無
也其姓也永出院口籍浪
大父思求父沐祥生三息
登海廟之東餘習詩書六藝
有五畝畝入泮庠不果歿姑
官以其子王姐娶而贅之以
未配果以天順戊寅閏五月
而物故附陸欣考堂側老少
林如堵皆成化二十年十月
為老遺終續先祖祀之計
他正為此耳嗚呼何以與年
而反此哉果有者不當授
與此皆必由天而弗由人也
彼妹者子生質鮮從
姑崇惜才妻而贅余
授者受者俱無幸矣
昔敬氏義官張鏡姑曼氏

大理叢書・金石篇

1

主編 楊世鈺

本篇主編 張樹芳

(京)新登字 030 號

責任編輯：周用宜 高淑芬
責任校對：李宗賢 易小放
封面設計：毛國宣

大理叢書·金石篇(全 10 冊)
DA LI CONG SHU · JIN SHI PIAN

本書主編：楊世鈺

本篇主編：張樹芳

*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

新華書店經銷

北京市通縣電子外文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8 開本 200 印張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1—200 套

ISBN 7-5004-1246-0/K · 187

大理叢書

大理叢書

楚圖南題

《大理叢書》編輯委員會名單

顧問組

組長 尹俊 馬曜

顧問(按姓氏筆劃為序)

王雲	王廷琛	王希季	王叔武	任繼愈	杜品忠	李瑾	李守信
李映德	李祖蔭	李崇學	李漢柏	李憲武	吳積才	何耀華	余戰生
宋蜀華	周耀文	林耀華	季羨林	徐琳	梁家	張旭	張文勳
張貢新	楊明	楊蘇	楊永新	楊克成	楊亮才	楊健強	楊遵道
費孝通	趙衍蓀	趙履寬	劉樹生	鍾振川			

編輯委員會

主編 楊世鈺

副主編(按姓氏筆劃為序)

李光榮 李昆聲 李鵬翔 李纘緒 周祜 張樹芳 黃振華

編委(按姓氏筆劃為序)

王以中	王立政	王振興	王樹五	尹明舉	杜秉鈞	杜國林	李一夫
李光榮	李安泰	李孝友	李昆聲	李桂元	李高遠	李朝真	李惠銓
李鵬翔	李纘緒	吳棠	周祜	周用宜	何潤	段金祿	段承中
馬敦	馬占先	馬漢儒	徐斌	徐自強	高中毅	陳天祥	陳國珍
張開元	張樹芳	張燦中	黃振華	郭惠青	楊民	楊聰	楊世鈺
楊宗賜	楊能裕	楊榮昌	楊曉東	楊應新	蔣喜棟	詹承緒	溪建輝
趙映東	趙寅松	趙嘉文	趙懷瑾	趙履謙	鄭文林	鄭松茂	齊魯仁
劉永祥	劉海寧	劉紹川	歐燕生				

《大理叢書·金石篇》編輯委員會名單

顧問 王雲 周祜

主編 張樹芳

副主編 杜秉鈞

編委(按姓氏筆劃為序)

王水喬	王振興	田懷清	杜秉鈞	李公	李朝真	何磊	何邦華
林滋平	段伶	段綬	徐維民	高永平	郭惠青	張明曾	張開元
張樹芳	楊虹	楊慎	楊延福	楊益清	謝道辛	蕭明華	

圖片攝影 徐維民 林滋平

《大理叢書》協作單位名單

雲南省民族學會白族學會 大理高等師範專科學校 大理州文物管理
所 大理州博物館 大理州圖書館 雲南省博物館 雲南省考古
研究所 雲南省圖書館 北京圖書館 雲南師範大學圖書館 (編
委會設雲南師範大學圖書館內)



《大理叢書·金石篇》編委合影

前排左起：李鵬翔 杜秉鈞 李光榮 周 祐 楊世鈺 張樹芳
黃振華 張開元 王振興
後排左起：何 磊 楊 虹 李 公 楊 慎 田懷清 張明曾
謝道辛 李朝真 高永平 楊宗賜

序

尹 俊

在中華文明發展史的長河中，以洱海為中心的大理地區占有一定的地位。文明是人類的物質生產和社會生活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它表示人類社會從氏族制度解體，進入有國家組織的歷史階段。史學界一般把夏代作為中國社會進入文明階段的開始。眾所周知，文明是由「野蠻」的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創造出來的。雲南迄今發現最早的新石器文化是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在洱海東部賓川縣發掘的白羊村遺址，它證明文明因素在洱海周圍開始萌生了。一九五七年發現的洱海北劍川海門口青銅器文化遺址，表明大理地區早在殷代晚期就已開始跨入文明社會的大門。一九六三年在洱海東南祥雲縣大波那發現距今二千三百五十年的木槨銅棺墓，證明洱海地區已出現國家的雛形。中華文明是指中華歷史文化的主體而言的，但中國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中華文明並不是指單一的漢族文化，而是包括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員的優秀文化。因此，大理地區的文明史，也是中華文明史有機組成的一章。長期生息、繁衍、活動在大理地區的白、彝、回等各族人民，用自己的勤勞智慧創建的豐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也是構成中華民族光彩奪目的文化殿堂裏的一塊瑰寶，對中華文明的發展做出了應有的貢獻。

大理地區在歷史上有「文獻名邦」之稱。早在秦漢時期，大理地區是我國通往外界最早的通道——南方陸上絲綢之路的樞紐。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一〇九年），漢武帝在大理地區設置葉榆（大理、賓川、洱源、劍川）、雲南（祥雲）、邪龍（漾濞南及巍山、南澗等地）、比蘇（雲龍西北部）、嵩唐（雲龍西部）五縣。東漢永平十二年（公元六九年）將洱海地區五縣併入新設的永昌郡，並增設博南縣（永平及其南部廣大地區）。蜀漢時期，諸葛亮在今大理州、楚雄州及麗江地區的部分縣設置雲南郡，兩晉因之。東晉以後，白族先民「西爨白蠻」貴族在今雲南大部分地區稱雄達數百年，而始終遙奉中原王朝正朔。相當於唐宋兩代的南詔和「大理國」自覺地主動地接受中原地區的典章制度和禮樂文化，使大理成為雲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達五百年之久，把雲南的社會經濟文化推進到「與中夏同」的水平。南詔、大理國又同東南亞、南亞諸國進行頻繁的經濟文化交流，成為我國西南陸上通向世界各國的橋樑。漢藏文化與包括今印度、緬甸、越南、柬埔寨、泰國以至中亞地區各國在內的佛教藝術、哲學思想，在這裏交匯、融合，成為巨流，又以更新的内容向四方幅射，極大地影響了雲南全境及鄰近地區歷史文化的發展。大理國時期，雲南的農業、手工業和社會文化有了進一步的發展和繁榮，大理國向中原地區輸出了許多精美的工藝品、貴重藥材和宋王朝抗擊金兵的戰馬以及佛經等，又從內地輸入了手工業品和大量的漢文書籍，其中包括醫藥、天文、軍事、五經、三史和文學等著作。白族知識份子很早就學會了漢文，用漢文寫文章、詩詞，在白族語言中也吸收了大量漢語詞匯。這種歷史發展中的相互促進，為元代以後中央封建王朝在雲南設置行省奠定了物質文化基礎。

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以後，由于國內和國際歷史條件的變化，大理地區各族人民對反對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和鞏固祖國西南邊疆，作出了積極的貢獻。歷史上白族先民分佈於洱海以至滇池一帶內地的平壩河谷地區，接受先進的漢族文化較早較多。通過白族的媒介作用，漢族的農業、手工業生產技術和中原地區的精神文化傳播給雲南境內的其他各族人民，以至周邊國家的人民，推動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的進一步發展和中外文化的廣泛交流。

在中華民族大家庭中，白族是一個寬容大度和親仁善鄰的土著民族。白族善於團結境內其他各族人民。歷史上白族先民白蠻名家大姓張建成、段忠國、楊牟利等曾協助南詔蒙氏兼併五詔和統一雲南。今天的大理白族自治州境內，自來以白族人口為最多，彝族次之，元代遷來的回族又次之，還有人口較少的其他各族

人民。一八五六年回族杜文秀在大理建立反清政權，受到白族人民的支持。與此同時，彝族農民李文學在彌渡縣瓦盧村誓師起義，同樣受到白族人民的支持。儘管清政府施展「以夷制夷」的手段，從中挑撥離間，使起義歸於失敗，但白、彝、回各族人民通過這兩次反帝反封建鬥爭加強了友誼和團結。

一九八三年，大理被國務院命名為首批全國二十四個歷史文化名城之一，同時也是我國四十四個對外開放的風景名勝地區之一。在國家的大力扶助下，大理各族勞動人民以嶄新的姿態，精心保護修復名勝古迹，大力搜集整理古代文化藝術遺產，使大理地區以其光輝燦爛的文化古迹，旖旎迷人的風景名勝而蜚聲中外。

隨着國家加快改革開放步伐，進一步擴大對外文化交流，我們在廣納博取地吸收人類文明一切優秀成果的同時，也要以積極主動的態度，向世界各國介紹中國悠久的民族傳統文化，以增進各國人民對中國的瞭解。為此，《大理叢書》編輯委員會從一九八八年以來，經過多年艱苦的工作，對大理地區珍貴的民族文化遺產進行了系統的搜集整理，分門別類，將自古以來大理地區歷史文化之精粹，分編為《金石篇》、《大藏經篇》、《藝術篇》、《方志篇》、《建築篇》、《考古文物篇》、《本主篇》、《族譜篇》、《史籍篇》、《民俗篇》十大專輯，分期分批出版，全面系統地介紹給全國、全世界人民，以期海內外廣大讀者能從中充分領略大理這顆東方藝術明珠的神奇魅力。同時，希望通過《大理叢書》的問世，能為學者研究中國西南古代史、民族史、文化史提供翔實的材料，以達到密切中外文化交流、增進互相瞭解、共同推進人類文明進步的目的。

一九九三年七月

序

馬 曜

中華文明是以漢族為主體包括中華民族大家庭中所有成員共同創造的。文明一詞既是指文化，又是指與「野蠻」相對的人類社會進步狀態。以洱海為中心的大理周圍地區在雲南古代文明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以海門口為標誌的殷末洱海文化向東發展，形成以石寨山為標誌的戰國到西漢的滇文化。在滇文化基礎上吸收東來的漢文化，又形成滇中和滇東的西爨文化。隋唐以後爨文化又西移洱海地區，形成南詔文化和大理文化。以上幾種文化是雲南文化的主流。它們之間有着縱向傳承和橫向交流的關係。讓我們簡略地回顧一下三千年來大理文明的形成和發展歷程。

洱海為中心的大理周圍是雲南文明的發祥地

人類文明是由「野蠻」的新石器時代的人們創造出來的。中國文明的多中心不平衡發展，在史前文化中表現得最為突出，特別在雲南延續時間最為長久。雲南舊石器文化的超前與滯後，可以從一九六五年雲南元謀縣大烏那村發現距今一百七十萬年或五十至六十萬年的元謀人「^{〔一〕}」和一九八六年十二月至一九八七年一月雲南省博物館、保山地區文物管理所、保山市博物館人員在保山縣蒲缥河北岸塘子溝發現距今七千年舊石器晚期遺址得到說明。這是同雲南處於過渡地帶的地理環境和生態因子多而複雜的特殊條件分不開的。越是早期，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制約性越大。在新石器時代，文明是多中心的，往後黃河流域逐漸趨於領先地位，中華文明從多中心逐漸變成單中心，又向四周輻射。離中心愈遠，影響越弱。在雲南，古代文明是從洱海周圍向滇池地區發展的。一九七三年至一九七四年在洱海東部賓川縣賓居鎮白羊村發掘出土距今四千多年的原始社會稻作聚落，是雲南迄今發現最早和具有代表性的新石器文化遺址。同類遺址在大理、祥雲、洱源、雲龍、劍川、鶴慶等地都有發現。「^{〔二〕}」早在一九三九年至一九四一年，吳金鼎等曾對洱海西岸的佛頂、馬龍等新石器文化遺址進行了發掘。「^{〔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又在洱海東岸金梭島、鹿鶴山、大墓坪和五里橋等地也發現了新石器和陶片。稍後於洱海的新石器文化是元謀縣大墩子新石器文化遺址，距今約三千五百年到四千年。而滇池周圍晉寧、昆明官渡等地的新石器遺址，其絕對年代上限不超過三千五百年。從白羊村、大墩子到昆明周圍的新石器文化，都是以發育稻作的河谷和湖濱盆地為經濟中心的文化，彼此之間有着共同性和連續性。

以黃帝為代表的仰韶文化，通過涵蓋大部分巴蜀文化和荊楚文化的大溪文化進入雲南。司馬遷在《史記·五帝本紀》中記載黃帝長子青陽降居江水（長江上游），次子昌意降居若水（雅砻江）。昌意之子高陽立，是為顓頊。今雲南、四川藏緬語各族均盛行幼子繼承制，不能與此無關。考古發掘還證明，早在新石器時期，仰韶文化西支馬家窑文化和齊家文化已南下經過巴蜀到達今雲南腹地地區。大理馬龍遺址的半地穴式房屋，與甘肅馬家窑和西安半坡相似；白羊村和大墩子平地起建的土木結構房屋，甚至與陝西廟底溝和河南洛陽王灣遺址接近，大理馬龍遺址的陶器刻符與西安半坡遺址、馬家窑文化（馬廠類型）、寺窪文化類似；白羊村出土的帶耳、帶流、高領的陶器屬於齊家文化類型。在馬龍峰下還發現華夏文化標誌的陶鼎殘足。與此同時，司馬遷也注意到古越文化溯西江而上到達夜郎以

西的滇東南以至滇西的情況，《史記·西南夷列傳》說：「南越以財物役屬夜郎，西至同師。」同師「在今保山地區，從一九八六年在保山塘子溝發掘出距今七千年的舊石器文化遺址來看，雲南與東南沿海以至東南亞的文化聯繫已經很早了。」

海門口到石寨山——滇文化的形成

真正的「文明」一詞表示人類社會從氏族制度解體，進入階級社會組織的歷史階段，也就是由新石器時代進入青銅器時代。史學界一般認為中華文明開始於公元前一五〇〇年至公元前一九〇〇年的二里頭文化時期。在雲南，約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也出現了文明的萌芽。一九五七年在洱海北部劍川縣海門口發現距今約三千年的青銅文化遺址，相當於商代晚期，這是雲南迄今發現最早的青銅文化。遺址出土銅器有十五件，其中十件是青銅器，有銅鉞、斧、鐮、鈎、鑿、錐、針、鐳等。還有人工栽培的粳稻。出土石器農業生產工具達一百五十件之多。海門口遺址標誌着洱海地區新石器文化向青銅器文化的過渡，由原始公社跨進了階級社會的大門。在以後發掘的劍川沙溪東周墓葬中，也出土一些青銅器，可見滇西一帶是雲南古代製造銅器較早的地區。一九六三年，在祥雲縣雲南驛大波那發現戰國中期距今約二千三百五十年的一座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墓內有巨木疊組的井干式結構的槨室，槨內有一具長達兩米由七塊銅板組成的銅棺。棺內銅器有鋤、銚等農具和一些紡織工具；兵器有矛、劍、啄、鉞、鐙等；生活用具有釜、杯、尊、勺、豆、匕、箸等；樂器有銅鼓、葫蘆笙、鐘等。棺內有一面象徵權力的銅鼓和一根銅權杖，推斷墓主人不僅是一個奴隸主，而且是當地農耕民族的政治領袖。「四」一九七五年、一九七六年，在楚雄萬家壩出土早於祥雲的春秋至戰國中期的墓葬七十九座，其中二十八座有隨葬的生產工具、兵器等，出土青銅農具達一百四十七件。商周青銅器多為兵器、食器、酒器、禮器。青銅農具很少。而雲南墓葬中出土青銅生產工具特別是農具很多，說明農業生產已經擺脫石器時代的原始農業，真正過渡到標誌生產力發展新水平的青銅時代。其中相當於春秋時期的第一期墓葬出土青銅短劍和銅矛接近洱海地區，早於祥雲大波那遺址。萬家壩出土五件目前所知時代最早的銅鼓，還出土一套羊角紐編鐘，兩者都是用以標明奴隸社會中奴隸主身份等級的器物。從萬家壩和大波那出土的銅鼓、編鐘和權杖，證明滇洱之間已出現國家雛形的組織。《史記·秦本紀》說：「（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三一六年），司馬錯伐蜀，滅之。……十四年，丹、犁臣蜀。……武王元年（公元前三一〇年）……伐義渠、丹、犁」。按張守節《史記正義》云：丹、犁，「二戎號也。臣服於蜀。蜀相殺蜀侯，並丹、犁二國降秦，在蜀西南姚府管內，本西南夷，戰國時屬滇國，唐初置犁州、丹州也。」丹、犁在姚州境內，即今祥雲、楚雄一帶，大波那和萬家壩墓主距今二千三百年至二千五百年，相當於秦惠文王、武王之時，或即丹、犁二國之王。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〇年，在晉寧石寨山進行了四次發掘，出土文物四千余件，其中青銅器二千件以上，有生產工具、生活用具、兵器、樂器等；一九七二年，在江川李家山發掘和清理古墓三十七座，出土文物一千三百餘件，與石寨山遺址屬於同一類型。大量出土文物表明，司馬遷在《史記》中所稱的「滇楚」人以農業為主要經濟部門，使用青銅的鐮、鋤、斧等農具，主要勞動力是婦女，種植稻谷，不知牛耕，生產上處於鋤耕農業階段。畜牧業也較發達，家畜有牛、馬、豬、犬、山羊、綿羊，牛的數量最多，還從事捕魚，撈螺蛳和狩獵。手工業能製造青銅器、鐵器、金銀器、玉石器、漆器、皮革、紡織品和陶器，青銅冶鑄業最為發達，銅錫配合比例恰當，工藝水平很高，青銅器表面的鎏金、錯金、鍍錫或鑲嵌玉石，十分精緻和美觀。一些兵器及其他器物上附飾有立體或半立體的人物和動物形象。七件貯貝器上塑鑄有複雜的人物活動場面，表現人們從事戰爭、祭祀等活動。人們盛行集市貿易，並與四川等地交往，輸入絲織品、銅鏡、弩機等，輸出牲畜和畜產品，賣出奴隸

從海門口到石寨山，貫穿着一條從初期青銅器文化逐步發展到成熟的青銅文化的內在聯繫，具有鮮明的地方民族特點。例如，刃部稍寬大的青銅斧與平面呈梯形的石斧形狀相類似；青銅圓刃鉞可以追溯到海門口的紅銅鉞，等等。不論以母系社會為標誌的雲南新石器文化或繼起的以奴隸社會為標誌的雲南青銅器文化，都顯示出一條從洱海周圍經楚雄地區向滇池地區發展的綫索。所有上述新石器和青銅器都分佈於湖濱河谷平壩地區，這種文化的主人是「椎結、耕田，有邑聚」的「靡莫」「七」或「靡非之屬」。^{〔八〕}

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一〇九年），漢武帝擊滅與滇王「同姓相扶」的勞浸、靡莫，在雲南設立益州郡，「以其故俗治」，「一」令滇王復長其民，因而以石寨山為代表的滇文化，在西漢時期得以繼續發展。但是，隨着郡縣制度的加強和商品經濟的發展，「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得其所欲」，「二」四川鐵器大量進入雲南。早在大波那和萬家壩遺址中，就出現豆、匕、箸和編鐘等中原器物。石寨山遺址中除了西南民族固有的樂器如銅鼓、葫蘆笙、銅鑼等外，還有從巴蜀傳來的鐔于和編鐘（共六枚，大小遞減）。青銅器圖像所表現的舞蹈豐富多彩，有類似今天滇西北彝、白等族的「鍋莊舞」，也有類似今天傣族的孔雀舞，還有羽舞、盾牌舞等。遺址中純漢式的器物也不少，如銅鏡、弩機、鏃斗、鐘、釜、燠爐、各種錢幣和漢印，除著名的「滇王之印」外，還發現「勝西印」和「王牢（？）私印」。江川李家山也發現「李德」、「黃義印」、「壽之人」漢印三方。經過新莽時滇池地區爨人大起義和文齊的治理，東漢時期漢文化得到進一步傳播，明帝時益州太守王阜在滇池地區「興起學校，漸遷其俗」。「三」昭通地區發現的《孟孝琚碑》記載：「孝琚受《韓詩》，兼通《孝經》二卷」。《華陽國志·南中志》也說今昭通地區「其民好學，多士人」。當時漢文化主要是通過宜賓到昭通進入雲南的。如朱提（昭通）、堂狼（會澤、巧家）洗常以雙魚為圖案，《孟孝琚碑》上端殘缺，周圍有龍紋及魚紋，與內地常見的「四神」圖案中的龍龜畫法一樣。「梁堆」出土的花磚和一些雕刻，都屬於內地風俗。總之，到了東漢時期，以石寨山為代表的滇文化，除銅鼓外，幾乎蕩然無存了。滇文化的斷裂和滇王國的消亡是和石寨山青銅文化的衰落分不開的。

由海門口到石寨山的滇文化基本上是雲南土著民族的文化，其中既吸收了中原的氐、羌、巴蜀、荆楚和百越文化成份，又吸收了東南亞和南亞文化成份。從東漢開始，在以滇池和洱海為中心的內地壩區，東來的漢文化逐步佔居主導地位。雲南的文化中心從滇中向滇東發展。東漢後期南中大姓崛起，其中與楚同姓的南中「方土大姓」爨氏在古滇國故地（今晉寧縣）形成勢力，其代表人物爨習於東漢建安十六年（公元二一一年）任建伶（今晉寧縣昆陽）令，「四」後降蜀官至領軍。唐樊綽《蠻書》卷六云：「晉寧州（今晉寧縣），古滇池故地也。……西爨王墓，纍纍相望。」滇王墓葬與西爨王墓葬俱在晉寧縣境，滇王式微而系出於「半」的爨氏興起，二者之間當有一定的淵源關係。自爨習以後逐漸發展，至七世祖爨琛「事晉為南寧州太守，屬中原亂，遂王蠻夷。」「五」西爨繼滇國之後，興於漢魏，盛於晉宋，擅命於齊梁，竊據於隋唐，獨步八代之間，綿延達五百年之久，在雲南歷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首先，它在中原分裂戰亂中保持偏安南中的局面，未受到來自外部的干擾，使兩晉時期瀕於殘破的雲南經濟得到了恢復和發展。北周時南寧州「戶口殷實，金寶富饒。」「六」到了唐代，今曲靖以西的西爨地區（壩區）已是「邑落相望，牛馬被野。」「七」其次，西爨統治者大量吸收漢文化，促進各民族的融合。史載西晉太安元年（公元三〇二年）的寧州是「南中形勢，七郡斗絕，晉弱夷強。」「八」過了一百七十多年，經過東晉戰亂，南齊初（公元四七九年）的寧州（今雲南）仍是「道遠土瘠，蠻夷衆多，齊民（漢人）甚少，」「九」而僅僅過了一百年，到了北周末（公元五八一年）的南寧州，已是「其地沃壤，多是漢人。」「三〇」上引「漢人」指「西爨白蠻」。漢晉時期入滇的漢人，多融合於爨氏，「二」即後來的「西爨白蠻」之中，同時也促進了「西爨白蠻」的漢化。再次，西晉太安二年（公元三〇三年）前後的寧州戰亂，引起滇東包括叟人在內的編戶屯民大量遷往滇西，「三」西爨勢力也繼續隨之向洱海地區發展。

隋唐之際，洱海地區分佈着與「西爨白蠻」同族屬的「河蠻」和烏蠻「六詔」，前者居住於洱海周圍的壩區，後者主要居住於山區和半山區。史載唐初「河蠻」的社會情況是：「松外諸蠻，大唐貞觀末為寇，遣兵從西洱河討之。其西洱河從嵩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數十百部落，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有數十姓，以楊、趙、李、董為名家（《新唐書》作貴族），各據山川，不相役屬。自云其先本漢人。有城廓村邑，弓矢矛鋌。言語雖小訛舛，大略與中夏同。有文字，頗解陰陽曆數。自夜郎滇池以西，皆曰莊蹻之餘種也。其土有稻、麥、粟、豆，收穫亦與中夏同，而以十二月為歲首。……」「三」這裡所記居住於今大理太和至喜洲一帶的「西洱河蠻」，「自云其先本漢人」，說明當時已蛻變為土著民族，可與「皆曰莊蹻之餘種」相印證。莊蹻以後的南中大姓都是少數民族化了的漢族和漢化了的少數民族。這是因為民族既是相對穩定的共同體，又是不斷變動的實體。《王仁求碑》說：「太伯逃吳，文身之風既習；少卿降虜，毳幘之化無違。」說明明代以前遷來雲南的漢人，大都「變服從其俗」，「西洱河蠻」大姓，多是少數民族漢化或漢族少數民族化。他們漢化程度頗深，顯然是以《爨龍顏碑》和《爨寶子碑》為代表的西爨文化向洱海地區發展的結果。又《新唐書·南蠻傳》說：「西洱河蠻，亦稱河蠻」，但「河蠻」也包括居住於洱海東部今大理鳳儀、賓川一帶的「東洱河蠻」。後「西洱河蠻」北徙於劍、共諸川（今劍川至鶴慶、麗江一帶），而「東洱河蠻」則未徙。《蠻書》卷五說：「渠歛趙（今大理鳳儀），本河東州也。……大族有王、楊、李、趙四姓。」河東即洱河（海）之東。河蠻分佈於洱河東西，各有大姓首領。據《爨龍顏碑》碑陰，西爨區域東抵貴州西部，直到唐初還包括洱海地區及其北部的「松外諸蠻」在內，「二四」比《蠻書》卷四所說從石城（曲靖）到龍和城（祿豐大腰站）的西爨區域大得多。隋史萬歲擊西爨，先到洱海地區，再到滇池，可以為證。天寶年間南詔崛起，向東發展

勢力，西爨統治區域相對縮小。但洱海周圍平壩地區的居民在族屬和文化上屬於西爨白蠻。當時東西洱河蠻的社會經濟已達到「與中夏同」的水平。

關於六詔，《新唐書·南蠻傳》說：「爨蠻西，有昆明蠻，亦曰昆彌，以西洱河為境，即葉榆河。……逐水草而居，夏處高山，冬入深谷，尚戰死，惡陣亡，勝兵數萬。」「昆明蠻」為六詔前身，即《史記·西南夷列傳》中的「昆明」人。唐初仍從事游牧，正處於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的軍事民主主義階段，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遠較河蠻落後。

唐貞觀二十二年（公元六四八年），遣梁建方從西洱河擊「松外蠻」（今永勝、華坪一帶），在擊敗為首的部落貴族雙舍後，派人招降河蠻，先後來附者七十部，九千三百戶，連十分懼怕想上船逃走的西洱河首領楊盛，也被說服投降。「二五」又貞觀二十二年，西洱河大首領楊同外、東洱河大首領楊歛、松外首領蒙羽皆入朝，授官秩。「二六」顯慶元年（公元六五六年）西洱河大首領楊棟歸附。「二七」當是這次戰役的結果。在稍前的永徽初年（公元七世紀中），左領軍將軍趙孝祖征「白水蠻」，遂至大小勃弄（今祥雲縣），斬小勃弄酋長歿盛，執大勃弄首領楊承顛。「二八」武則天延載元年（公元六九四年），洱海地區首領董期率所部二萬戶內附。「二九」睿宗景元元年（公元七一〇年），監察御史李知古又擊「西貳（洱）河蠻」。「三〇」唐初「河蠻」特別是「西洱河蠻」受到唐王朝的多次重大打擊，勢力遂衰，六詔乃乘時而起。

六詔並存時期始於唐武后永昌元年（公元六八九年）至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先後五十年。六詔中的越析詔是今納西族先民，其地在今賓川縣賓居街，隋初即已出現。次為南詔，在巍山縣南，自言為哀牢之後，貞觀初始居蒙舍川。蒙嵩詔地在陽瓜州，《王仁求碑》載陽瓜州刺史蒙欽，當即蒙嵩詔主。浪穹詔在今洱源縣。武后永昌元年，傍時昔以二十五部去吐蕃降唐，任浪穹州刺史。《蠻書》卷三載，「邊賧，一詔也，主豐咩」。「施浪，一詔也，詔主施望欠。」初居鄧，後為浪穹詔所奪。後施浪詔遷於浪穹東北蒙次和山東北一帶。「浪穹詔豐時、豐咩兄弟俱在浪穹，後豐咩襲鄧賧居之，由是各為一詔。」

南詔是以「烏蠻別種」^{〔三〕}貴族和白蠻大姓（貴族）聯合建立的政權。據《南詔德化碑》題名，這個政權中的清平官、大軍將，白蠻佔多數，還有後來的三十七部和今傣族貴族首領。在南詔出現之前，洱海南部地區（今彌渡、巍山、南澗一帶）為白蠻張樂進求統治的「白子國」（亦稱「白國」、「白崖國」、「雲南國」、「建寧國」等）。據胡蔚《南詔野史》「建寧國」（不是東晉成帝咸和八年李雄陷寧州建立的建寧國）云：「後漢諸葛亮武侯南征，……及封白子王仁果十五世孫龍佑那為首長，賜姓張氏，於白崖築建寧城，號建寧國，立鐵柱……後張龍佑那仍遷國澄江，傳三十二世至十七世孫張樂進求，唐太宗乙酉貞觀二十三年，封為首領大將軍。後見蒙舍川蒙細奴邏有奇相，遂妻以女，遜國與之。」這段記載中顯然有附會成份，但也有合理因素。東漢末年，洱海地區「有上方方夷，……土地有稻田畜牧，但不蠶桑。」^{〔三二〕}「上方夷」是分佈於山區的烏蠻，即後來的六詔。「下方夷」是分佈於河谷壩區的白蠻，即後來的「河蠻」。當時洱海地區附屬蜀的永昌郡，諸葛亮雖不到滇西，但在已具備郡條件的洱海地區新設立了雲南郡（治雲南縣，即今祥雲縣），實行土流兩重統治，「即其渠帥而用之」，^{〔三三〕}封當地酋長龍佑那為酋長，以呂凱為雲南郡太守。現存日本京都有鄰館的《南詔中興二年畫卷》^{〔三四〕}（以下簡稱《畫卷》）曾繪有白子國為其鄰近的南詔取代的故事，可為佐證。《畫卷》中記載唐初洱海地區的「白蠻」和「烏蠻別種」同屬於一個部落聯盟。據上引張樂進求妻細奴邏以女來看，當是親屬部落聯盟。這個聯盟以白子國王張樂進求為盟主。《畫卷》中有文字說明：「按《張氏國史》云：雲南大將軍張樂盡（進）求、西洱河右將軍楊農棟、左將軍張矣牟棟、巍峰刺史蒙邏盛、勳公大部落主段字棟、趙覽宇、施棟望、李史頂、王青細莫等九人共祭鐵柱」。這九人中，有八人按姓氏當為白蠻首領，唯巍峰刺史蒙邏盛一人為烏蠻別種。時蒙氏勢力強大，張樂進求乃讓盟主之位於蒙邏盛。（按《畫卷》以興宗王蒙邏盛為中心，而「南詔野史」則以其父細奴邏為中心。《畫卷》出自唐末五代人手筆，在《野史》之前，故從前說。）

由於鐵柱會盟中白蠻大姓人多勢眾，被推為盟主的邏盛不得不重用白蠻大姓。邏盛於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六七四年）立，以白蠻大姓張儉（建）成為相。唐睿宗先天元年（公元七一二）盛邏皮立，遣張儉（建）成人朝於唐。唐玄宗開元二十六年（公元七三八年），皮邏閣在唐朝支持下兼併其它五詔，遷都太和城，建立了南詔。統一雲南的閣羅鳳，立於唐玄宗天寶七年（公元七四八年），以白蠻段儉魏（段忠國，見《南詔德化碑》碑陰）為清平官、大軍將，輔助南詔，先後大敗唐將鮮于仲通和李宓於洱海周圍，為南詔開國功臣。天寶戰爭是唐王朝推行錯誤的民族政策造成的。代宗大曆元年（公元七六六年）閣羅鳳在太和城（今大理太和村）立《德化碑》，記述被迫反唐的苦衷，對國人說：「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後世容復歸唐，當指碑以示唐使者，知吾之叛唐非本心也。」唐代著名政治家李泌說：「雲南自漢以來臣屬中國，楊國忠無故擾之使叛。」〔三五〕貞元十一年（公元七九五年）。南詔和唐重修和好。

據文獻記載，南詔歷代君主的清平官和大軍將，十之八九是白蠻貴族。唐白居易《長慶集》卷四十《與南詔清平官書》云：「敕南詔清平官段諾突、李附覽、爨何棟、尹輔酋、段谷普、李弄傍、鄭蠻利等」。白蠻多冠漢姓，其名字與漢族基本相同，「烏蠻別種」蒙氏則實行冠姓父子連名制。書中具名除鄭蠻利（鄭回）為漢族外，都是白蠻。又《文苑英華》卷四百七十《與南詔清平官書》云：「敕段宗傍、段酋琮、獨棟、楊遷、趙文奇、蒙善政、李守約等……」，七人中蒙善政是烏蠻別種，獨棟族屬不清，其餘五人為白蠻。又隆舜時以趙隆眉為宰相，以段義宗、楊奇鯤為清平官，都是白蠻。白蠻是南詔的主體居民以及賦稅和兵役的主要承擔者。白蠻大姓先後幫助蒙氏統一六詔，兼併西爨。而南詔的主要敵人是其他烏蠻五詔和後來北遷依附吐蕃的烏蠻「三浪」，後者一直是南詔的心腹大患。烏蠻別種和白蠻是兩個民族，正如司馬遷說的「是以秦用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蒙而強威宣。……故意合則胡越為一家，由余、越人蒙是矣。不合則骨肉出逐不收，（丹）朱、象、管、蔡是矣。」〔三六〕所謂「意合」即為建立統一雲南全境聯合政權的目標一致。由於白蠻漢化程度較深，生產水平較高，南詔不僅依靠洱海周圍之白蠻統一洱海地區，而且「閣羅鳳遣昆川城使楊牟利以兵圍脅西爨，徙二十萬戶於永昌城。烏蠻以言語不通，多散林谷，故得不徙。……日用子孫今並在永昌城界內。」〔三七〕「永昌城」包括洱海周圍地區，而「永昌城界內」則限於今保山地區。所謂「言語音白蠻最正，蒙舍蠻次之，諸部落不如也。」〔三八〕《蠻書》稱「六詔並烏蠻」，而《新唐書》卻說南詔是「烏蠻別種」，當與東爨和六詔中的其它五詔有所區別，表現在其語言接近白蠻。這是古藏文寫本稱南詔為「白蠻」的原因。〔三九〕由於蒙舍語音接近白蠻，不能不是它遷徙西爨的原因之一。世隆之子隆舜，自號「大封人」，〔四〇〕改國號曰「大封民國」，〔四一〕「封民」即「楚民」或「白人」。隆舜亦作法堯，改用效法堯舜的漢族名字。南詔王族後期已經完全白蠻化了。

南詔上承西爨文化，下啓大理國文化，其政治制度和禮樂風化極力規模唐朝。早在南詔建立前的唐武后聖曆元年（公元六九八年）所立《王仁求碑》（在今安寧縣大石莊），碑文中天、地、國、日、月、聖等字採用了武則天頒行字體。王仁求是白蠻，曾為河東州（今大理鳳儀，亦說在安寧附近）刺史，碑文說他「開夜郎之道，綏哀牢之圉」，自姚州以西二十餘州「俾睦其德」，可見唐代文化已深入到洱海地區。

南詔統一雲南和遷徙西爨使雲南政治經濟中心西移，促進了洱海地區科學文化和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首先，南詔大興水利，開發「殊為精好」的山田，做到「水旱無損」。公元九世紀三十年代，在大理築了「橫渠道」，灌溉東郊和城南的田地，稱為「錦浪江」；修建了點蒼山玉局峰頂的「高河」水利工程，將山水匯合為池，然後下流平原，引導十八溪的水灌田。〔四二〕據說唐朝羅時所創建的鄧川羅時江的分洪工程，增加了灌溉面積。〔四三〕南詔根據雲南氣候實際，制定「以寅為正，四時大抵與中國小差」的曆法，並且掌握辨別晴雨和風力的氣象知識。其次，南詔的冶金業很發達，《南詔中興二年畫卷》二段中的犁、六段中的皮囊狀物即「囊」，

作鼓風冶鐵之用；所製鐵刀劍有「鬱刀」、「浪劍」和「鐸鞘」，「所擊無不洞」。^{〔四四〕}出土於城址的「南詔有字瓦」上的文字，一部份借漢字增損筆劃，另一部份用漢字爲符號記白音，這就是南詔時期出現的「白文」。

南詔的重要碑刻有《南詔德化碑》，乾隆五十三年（公元一七八八年）爲王昶在大理太和村訪獲。碑高三·九米，寬二·四米。正書，殘泐甚多。碑文反映了南詔的社會情況，如「西開尋傳，祿鄆出麗水之金」、「建都鎮塞，銀生於墨嘴之鄉」、「越賧天馬生郊，大利流波濯錦」，說明南詔金銀開採和養馬業、絲織業的發展。碑文所述南詔初期歷史，可補文獻之不足。碑文爲白蠻王蠻盛作，唐代著名文人杜光庭書。全文抒情似行云流水，跌宕生姿，一氣呵成。書法秀整，有北周北齊遺法。現存鹽津縣豆沙關山崖上的《袁滋摩崖》，範圍約爲高〇·五一米，寬〇·二七米，共八行，行三至二十一字，左行，正書，末行題名篆書。摩崖立於唐德宗貞元十年（公元七九四年）。先是唐四川節度使韋皋先遣崔佐時與異牟尋在蒼山結盟，共同擊敗吐蕃於神川。袁滋一行奉唐廷命冊封南詔，六月從長安出發，九月經過石門，摩崖刻石留念，十月末到達今大理。^{〔四五〕}《新唐書·袁滋傳》稱袁滋「工篆隸，有古法」。此碑爲唐朝和南詔關係史上的重要資料。

南詔貴族莊園白巖城、周迴四里，前廳後院，修廊曲院，備極奇巧。^{〔四六〕}著名的大理崇聖寺三塔，主塔（千尋塔）高達六九·一三米，凡十六級，十分雄偉。還有建於南詔末期的弘聖寺塔和佛圖寺塔（又名蛇骨塔）。昆明今東寺街的西寺塔和東寺塔，塔磚有梵文亦符咒之類，當是南詔末年或大理國初年所建。大姚城西白塔，相傳爲唐時西域蕃僧所建。南詔後期修建的佛塔很多。彌渡縣城西南詔鐵柱，陽文正書「維建極十三年歲次壬辰四月庚子朔十四日癸丑立」。建極是蒙世隆年號，建極十三年爲公元八七二年。巍山巔圩圖南詔宮殿遺址出土的方磚、瓦當和滴水，其圖案形式和長安興慶宮遺址出土物極爲相似。五華樓爲晟豐佑所建，以會西南夷十六國君長。樓方廣百尺，上可容萬人。

南詔時期，有不少人士到內地學習，內地流寓文人鄭回教授子弟，出現了一批被稱爲「高手」的能詩善文的文人，其收入《全唐詩》、《全唐文》的作品被稱爲「佳作」。史稱南詔王異牟尋「頗知書，有才知」。尋閣勸的詩見於記載的有《星回節游避風臺》，清平官趙叔達有和詩一首，詩中有白蠻俚語「波羅」（虎）、「毗勇」（野馬）等。清平官趙叔達的《題大慈寺芍藥》詩有「繁影夜鋪方丈月，異香朝散講筵風」。^{〔四七〕}清平官楊奇鯤是當時大理著名詩人，其《途中詩》有「風里浪花吹更白，雨中嵐色洗還清」。^{〔四八〕}都傳爲佳句。南詔駢文、散文亦有佳作，如大中初南詔朝獻質問唐朝縮減南詔派往成都學習名額，有「一人有慶，方當萬國而來朝；四海爲家，豈計十人之有費」之語。

南詔的音樂舞蹈也很出色，鳳伽異曾由長安帶回唐朝賜給的龜茲樂隊。這時南詔也有了自己的樂隊，創編了著名的《南詔奉聖樂》，在唐宮廷表演，被列爲唐代音樂十四部之一。^{〔四九〕}南詔的《獅子舞》也於此時傳入中原地區。南詔時期還先後傳入《驃國樂》和《彌臣樂》等。

有故國（唐、宋）遺風的大理文化

公元七三八年統一雲南的南詔於公元九〇二年覆亡。經過大長和、大天興、大義寧三個王朝三十多年的短期統治之後，白蠻段思平於後晉天復二年（公元九三七年）以「減稅糧」、「寬徭役」^{〔五〇〕}爲號召，討滅大義寧國主楊干貞，建立大理國，基本承襲南詔版圖，轄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傳二十二世，共三百一十八年，大體相當於宋朝的起訖時間。

史載段思平「盡逐楊(干貞)氏奸臣，罪大者明正罰，表暴貞良，更易制度，損除苛令。」^{〔五〕}實行階梯式層層分封的「世官世祿」的封建等級制度。大理政權與南詔不同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基本上不對外擴張，與宋王朝和鄰近國家友好相處。這與其建立在農村公社基礎上的封建領主制和崇信佛教有一定的關係。

大理國的社會經濟文化較之南詔有了進一步的發展。首先，冶鐵技術達到相當高的水平，推動了農業、手工業的發展。史載「雲南刀，即大理所作，鐵青黑沉沉不蝕，」^{〔五二〕}被形容為「吹毛透風。」^{〔五三〕}包括農具在內的「器械精良」，^{〔五四〕}得以興修水利，開墾大片農田。楊佐路過姚州時，認為其地農業生產水平「略如東蜀之資(中)、榮(縣)。」^{〔五五〕}元初郭松年過祥雲時看到青海湖「灌溉之利達於雲南(祥雲)之野」，白崖(彌度)則是「居民輳集，禾麻蔽野」，而鳳儀有「神莊江貫於其中，溉田千頃，以故百姓富庶，少水旱之災。」^{〔五六〕}其次，大理的手工藝品在全國享有很高的聲譽，用象皮制造的甲冑，「堅厚與鐵等」，^{〔五七〕}刀箭不易穿透。披氈也很有名，「其上有核桃紋，長大而輕為妙。」^{〔五八〕}彩漆器皿聞名遐邇，而漆雕技術尤為突出，所雕刻的漆器「宋剔」，傳到明代，被視為珍品。^{〔五九〕}直至元明兩代，封建皇朝宮廷裏所用的工匠，還不斷取之於雲南，以致「滇工佈滿內府。」^{〔六〇〕}再次，大理的畜牧業也很發達，並與宋王朝和鄰近國家進行貿易。「大理馬」聞名全國，源源輸往內地，成為宋王朝抗擊金兵的戰馬來源之一。《宋史·兵志》說：「每擇其良赴三衙，餘以赴江上諸軍。」所謂「三衙」，據《建炎以來繫年要錄》卷五五說：「乃命(廣西)經略司，以三百騎賜岳飛，二百騎賜張浚，又選千騎赴行在」。岳飛於紹興四年(公元一一三四年)以後，即投入抗金戰爭，其戰馬一部份來自大理國。《嶺外代答》卷六說：「蠻馬之來，他貨亦至。蠻之所賣麝香、胡羊、長鳴雞、披氈、雲南刀及諸藥物，吾商賈以賈綿繒、豹皮、文書及諸奇巧之物，於是譯者平價交易。」與此同時，大理與緬甸、波斯、昆侖等國都有貿易往來。大理城和鄯闡城已形成重要商業城市。元初馬可波羅到昆明時說：「城大而名貴，商工頗眾。」^{〔六一〕}基本上可反映大理國後期昆明城的情況。

佛教是大理國的宗教信仰。民間除信仰相當於社神的本主外，^{〔六二〕}上自國王，下至平民，普遍信仰佛教。南詔後期(八——十世紀)最初從西藏、四川、西北等地傳來的是「婆羅門」和瑜珈密宗。由中原傳入的大乘華嚴宗等流派也有一定影響，但不能同密宗相抗衡。密宗的僧人稱為「阿闍梨」(亦作「阿叱力」)，所以又稱「阿闍梨教」。相傳「阿闍梨教」是觀音化身的梵僧傳入雲南的，以故大理各階層人民特別崇拜觀音。人們取名多用佛號，習見的如高觀音明、陳觀音婢、張觀音海等。民間不論貧富，家家都有佛堂。密宗作為最流行的教派又分兩類，居山寺者曰「淨戒」，居家室者曰「阿闍梨」。相傳段思平不斷建寺，鑄佛萬尊。大理國雖未實行政教合一，但佛教與政權之間關係十分密切。很多官吏都從「師僧」中選拔。大理國二十一個國王中就有九人避位為僧。密宗的最高法師被封為國師。清平官等要職常從寺廟僧人中選任。官場失意者，也往往為僧。大理國初期年年建寺，後來專擅政權的高氏也建寺不已。大理國也從內地大量吸收儒家文化，常常通過官方及民間渠道學習中原文化。宋崇寧二年(公元一一四三年)，大理國主派遣使臣高泰運到宋廷求書，「求經籍得六十九家，藥書六十二部。」^{〔六三〕}大理國利貞二年(公元一一七三年)，大理商人李觀音得、董六斤黑、張般若師等到廣西橫山賣馬，開列的購買經書名單有：《文選五臣註》、《五經廣註》、《春秋後語》、《三史加註》、《都大本草廣註》、《五藏論》、《大般若十六會序》、《初學記》、張孟《押韻》、《切韻》、《玉篇》、《百家書》等。^{〔六四〕}大理國各階層誦讀儒家經典蔚然成風。大理建國開始即實行開科取士，所取悉僧道讀儒書者。由於人們篤信佛教，逐漸形成佛儒合流的趨勢。「師僧」有妻子，然往往讀儒書。出家為僧和誦讀佛、儒經典，已成為進入仕途的重要途徑。大理國的道教徒也讀儒經，但其勢力遠不如佛教和儒教。

大理國的文化藝術也很發達。史學方面有《白史》、《國史》等書。民歌和傳說故事，是白族文學的主流。舞蹈《踏歌》起源很早，各個時代利用這種形式歌唱萬